

【学者研究】

代际经验中的“文学—政治”难题

——谈洪子诚先生近年来的“文本转向”

罗雅琳

【摘要】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近年来的研究呈现出“文本转向”的趋势。他的相关思考诞生于一系列与学生辈文学研究者的对话中。年青一代面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希望从历史中拯救出文学曾经拥有的社会政治能量,因此在对于“文学—政治”关系的理解问题上与洪子诚先生存在差异。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洪子诚先生将创作者的才情、修养、想象力、思想、精神、艺术经验视为决定文学品质的关键因素,并期盼通过作者、文学管理者和文学研究者三类“有创造力的人”的能动作用,使文学可以在彻底投身外部和彻底的“纯文学”追求之间寻找一个富有弹性的位置。这种对于“有创造力的人”的发现,也改变了1950—1970年代文学的整体面貌,进而呈现出社会主义文化的“经典性”所在。

【关键词】洪子诚;文本转向;纯文学;经典性

【作者简介】罗雅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文艺论坛》(长沙),2023.1.48~54

在2002年荣休之前,洪子诚先生的主要身份是文学史家。自1980年合著的《当代文学概观》算起,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1998年出版的《1956:百花时代》、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1995年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2002年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等巨著奠定了洪子诚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不可逾越的地位,不仅以“个人著史”的宏伟气魄让人惊叹“‘当代文学’终于有了‘史’了”^①,更对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文学制度研究、当代文学史料学等细分领域具有开辟之功。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洪子诚学术作品集”,以此作为对洪先生学术贡献的阶段性总结,其中所收录的八本著述均可被归类为“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界常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两条路径之间划出较为分明的界限,而洪子诚先生的学术路径显然一般被归为前者。

不过,近二十年来,重要的变化逐渐出现,“文

本”和“阅读”成为洪子诚先生著述中的高频词汇和关注重心。2000年,洪子诚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黄子平著作的读后感《文本“缝隙”与“历史深处”》,这是“文本”一词首次出现在他的文章标题中。文学研究如何发现历史与形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这篇短文的关注重点^②。2004年,洪子诚先生与耿占春、敬文东、姜涛等人共同发表笔谈《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其中,他提出,在对文学文本展开“政治、社会历史方向的阐释”时,关键在于考察“文学、‘叙事’在‘历史’及其建构中的作用”^③。此后,洪子诚先生写作了一系列以“文本”为中心的“阅读史”文章,进而,这种对于“文本”的关注也逐步对他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我的阅读史》《阅读经验》《文学的阅读》《读作品记》等著作的命名方式中瞥见这种变化,更能发现《材料与注释》和《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两大文学史研究力作也往往将解读文本作为“起手式”。当然,这种对于文本的关注依然不脱文学史家本色。它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作为“内部研究”的“文学批评”，而是在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往返中，发展出一套洪子诚式的“文本—历史”解读法。

为什么洪子诚先生会在近二十年中转向“文本”？表面上，他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在《我的阅读史》序言中，他表示自己退休后“明显感到缺乏前些年教学、研究的情绪和精力”，由此转向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阅读史”的写作^④。不过，这恐怕是一种谦辞——只要看看先生近年来新作迭出的高产程度，就会发现他并不缺乏研究精力；只要与先生有过真实的交流，就会发现他总是以这种谦辞将自己的真实思考巧妙地隐藏起来。

这种“文本转向”的发生，其实也并非突然。如果仔细研读洪子诚先生对于“文本”产生兴趣的过程，则会发现他的相关思考诞生于一系列与年青一代文学研究者的对话之中。这种对话发端于对于“80年代文学”和“纯文学”的评价问题，进而，两代文学研究者所携带的不同历史经验、情感结构和现实关怀在如何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交锋，逐渐催生出洪子诚先生关于“文学—政治”关系的独特解读法。这是一种既尊重自我的真实历史经验又不固守“个人立场”的绝对正确，既对年青一代的全新诉求保持开放心态又对流行思潮中的弊病保持清醒与警惕的研究态度。

一、起点：“80年代文学”与“纯文学”的评价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在1950—1970年代的“一体化”和198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是洪子诚先生最为著名的一组文学史概念。这组概念一般被归为当代文学体制研究的范畴，也即属于“文学史研究”，但事实上，它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关联着文学价值的判断问题，与专事品评作品的“文学批评”密不可分。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文学与想象力和审美活动相关，天然地负载着自由和解放的内涵，因此，“一体化”的1950—1970年代文学往往被默认为是艺术

品质较低的，“多元化”的1980年代文学则被默认为是更具活力的。因此，尽管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由于将国家文学制度的建立与转型而非“现代性”或“启蒙理想”的实现视为结构文学史的主要线索，从而与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史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一体化”和“多元化”两大概念背后所暗含的文学等级观念依然遭遇了一些学生辈研究者（主要是那些持较为明确的左翼立场的学生们）的质疑。在2002年的通信中，李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1950—1970年代文学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得极为精彩，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制度性权力在80年代文学中同样无处不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与1980年代文学的关系不应被视为“一体”和“多元”的关系，而应该被视为一种“一体化”和另一种“一体化”之间的关系^⑤。2003年，当时尚为北大中文系在读博士生的刘复生、鲁太光、李云雷等人对洪子诚先生展开访谈。在后来洪子诚先生展示的材料中，其中一位学生提出：既然“多元”较之“一体”被认为是更适合文学发展的环境，那么，为何在“多元”的今天，文学反而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危机，尤其是与现实、与大众脱节的危机？^⑥

这两个质疑非常具有代表性：前者以福柯式的解构主义态度道出权力制度无处不在的无奈困境，指出1980年代的“纯文学”并不“纯”，也不可能实现彻底的“纯粹”；后者则展现出一种希望从“纯文学”中突围，进而恢复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新左派”式热情。尽管洪子诚先生对于“纯文学”之“纯”并不怀有过分的想象，但“一体”和“多元”这两个概念依然预设了一种作为“内部”的文学和作为“外部”的政治之间的对峙，并期盼着“外部”压力的纾解能够使“内部”获得更为宽松、更为“纯粹”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来自年青一代学者的两个质疑都表达出一种对于文学必须面对“外部”、必须回应“外部”、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于“内部”的焦虑。所谓“文学的外部”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会对自由自然的艺术人格造成压力的“制度性权力”，又是滋养着文学的“源头活水”

和文学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文学、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外部”？这是1980年代“纯文学”理想破灭之后的普遍难题，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中心是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等第一批代表性著作的洪子诚先生也一直关心着这个问题。在2003年的访谈中，学生们也谈到了李陀2002年的访谈《漫说“纯文学”》，这篇访谈正是“纯文学”的亲历者和有力推动者李陀的自我反思之作。

在2002年的通信和2003年的访谈中，洪子诚先生都没有直接回应学生们的质疑。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能从后来的一系列文章中读到 he 反复回味和回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第一次回答，发生于2004年左右。

2004年初，在与耿占春、敬文东、姜涛三位分别出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的晚辈共同发表的《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中，洪子诚先生指出，1980年代对于“纯文学”和“文学自主性”的提倡，在当时是具有“革命能量”的，但后来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负面的影响”，也即导致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和文学批评“普遍地疏离甚至逃避现实的趋势”。但他随即指出，“纯文学”或许不对当前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负全部责任。一方面，“纯文学”和“内部分析”“远远没有达到主宰性的，让人忧虑的境地”；另一方面，“纯文学”讨论中依然包含着“具有合理性和仍有待开发的‘能量’”，尤其是如何突破1950—1970年代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僵硬关系，如何开掘审美性在现代生活的革命意义等等^⑦。面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与现实逐步脱节的困境，洪子诚先生并没有将“纯文学”一竿子打倒，反而是委婉地提出“纯文学”依然携带着值得重视的“能量”，以此缓解学生辈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将文学与现实对接的急切态度。

接下来，2004年底，学生冷霜的访谈再次小心翼翼地提出和李杨类似的困惑：他感到洪子诚先生的

史论“似乎更倾向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对文学的多元化也抱有期待，文学趣味上也有一种精英化的取向”。这里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对于多元化的期待”和“精英化的文学趣味”，指涉着洪子诚先生对于与政治较为疏离、更具有“文学性”的作品的偏爱。冷霜提出此问，其中的潜台词是：这样的趣味是否个人化的和较有限度的？在自由主义的文学观之下，是否无法恰当地评判那些与集体主义、革命经验和社会动员紧密关联的文学作品？对此，洪子诚先生的答案是：

反思80年代的“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理据，指出其意识形态含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功绩，也不是说在今天已完全失效。批评在“纯文学”的想象中过多否定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积极“回应现实”的“特殊经验”，也不见得应该回到文学“工具论”立场。指出“政治一开始”就在文学里面，也并非说政治（阶级、民族、国家、性别）可以穷尽、代替文学。在“世界（西方）文学”的背景下，重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文学作为“异类的声音”，作为“小文学”的传统意义，这也同样不是说要完全改变“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描述图式。^⑧

这样的答案与《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中的表述一脉相承，但是进一步提出：自己既不完全赞同“纯文学”，也不完全赞同回到“工具论”，而是希望在艺术追求和社会抱负之间寻求一条可行的“中道”。

洪子诚先生似乎一直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直到2009年4月，他收到了“北京的另一位学生”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这位学生表示，自己同意洪子诚先生对于冷霜问题的大部分回答，但“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描述图式”或许并非完全难以改变。洪子诚先生将“十七年”和“文革”文学视为左翼文学不断因“纯粹化”而丧失活力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描述得“像一个抽象的宿命似的”，但这位学生提出：“有没有可能去讨论那个看起来十分光滑的话语形态内在的复杂性？”洪子诚将这位学生的看法和2004

年刘复生、鲁太光、李云雷等人的提问放置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体化”论述及其他——几份质疑、批评的材料》。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未表露自己对于学生们这些提问具体持何种态度,只是表示:“现在和他们可能仍存在差异”“分歧和差异不可避免”,而且“他们的提问、质疑,现在看来既有意思,也很重要”^⑧。

这些年青一代研究者的表述和重点各异,但其中存在明显的共性,也即:并不对1950—1970年代文学、尤其是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怀有拒斥心态,相反,因为他们的学术生涯直接遭遇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反而更希望从历史中拯救出文学曾经拥有的社会政治能量。他们所面对的学术语境首先是19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然后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1950—1970年代文学;他们所感受到的束缚首先是19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而不是1950—1970年代的过度“政治化”。相比之下,对于洪子诚先生而言,这一切则是反过来的。代际的差异延伸出问题意识的差异,提问和质疑也就由此而生。洪子诚先生能够理解这种差异,他一方面并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仍然希望找到能够弥合代际分歧的文学研究者的“最大公约数”。

在持续的写作和思考中,洪子诚先生对此逐渐形成了清晰的答案。2012年,当季亚娅的访谈再次提出如何理解“文学—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洪子诚先生首先表示,这个问题似乎是个“过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争论一番”的永恒问题,继而,他明确提出:各个时期文学的兴衰成败往往“或者说是太强调政治(‘政治工具论’),或者说是因为远离了政治(‘纯文学’)”,但事实上,更应该注意的是“作家的才情、修养、想象力”^⑨。紧接着,2013年初,洪子诚先生与吴晓东展开了一次以“文学性”和“文学批评”为中心的对话,其中,洪子诚先生更是主动谈到:虽然当前普遍存在着对于1980年代“纯文学”观念的反思,但是“文学的问题在于作家思想、精神、艺术经验上的

缺失,而不是外在的某种思潮的后果”^⑩。对于这个缠绕了他多年的问题而言,这样的回答姿态是非常有力 and 笃定的。面对无法避免的来自政治和市场的压力,他再次将创作者的思想、精神、艺术创造力推向至关重要的位置,但他并不寄望于创造出一个与政治和市场相隔绝的“纯粹”的艺术空间,而是致力于在彻底投身外部和彻底的“纯文学”追求之间寻找一个灵活的、富有弹性的位置。

二、重点:“有创造力的人”

洪子诚先生将作者的思想、精神、艺术经验、才情、修养、想象力视为“文学的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他期盼文学能够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占据一个灵活的空间,这个空间正是由有创造力的人所开辟出来的。这种“有创造力的人”,在洪子诚先生笔下涉及三个类别:作家、文学管理者和文学研究者。

作家,是他所关注的第一类“有创造力的人”。一直以来,洪子诚先生都在持续思考作家的个体精神如何在看似“一体化”的秩序之中制造出差异性的问题。不过,这种差异性,在其早期研究中体现为与政治拉开审慎距离的怀疑主义态度,在其近期研究中则体现为如何在政治的漩涡中心依然保持真诚和展现艺术创造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洪子诚先生在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时倾向的变化。他在2010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中关注的是契诃夫的“怀疑的智慧”、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即与乐观、明朗、强调激烈冲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较具距离的作家作品;但到了2017年出版的《读作品记》和2022年出版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其中固然也涉及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但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科夫斯基等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占重要位置的诗人们成为他更关注的对象。表面上,洪子诚先生研究的是这些诗人的中国接受史,如马雅可夫斯基如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视为革命诗人的旗帜乃至“样板”,到了1990年代及其后,却作为“未来派”和爱情诗人而被重新发现。但实际上,这

种对于接受史的梳理却是一种委婉的提醒:既是提醒人们完整地理解“革命诗人”和“政治抒情诗”的复杂艺术追求,更是暗示社会主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绝非那么简单僵硬,马雅可夫斯基对于爱情的书写、伊萨科夫斯基对于新生活和新世界的“叙事”正是那种提供“弹性”的重要中介物。

文学管理者,是洪子诚先生所关注的第二类“有创造力的人”。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虽然研究者们都希望能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寻找“一体化”之下的差异性存在,但不同人的寻找方式是不一样的。在1990年代兴起的“潜在写作”概念的阐释中,具有差异性的文学被少数人放置在一个理想中的“抽屉”之中,这个“抽屉”是一个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一体化”力量无法触及的空间。在1990年代的“再解读”潮流中,最流行的一种思路是寻找红色经典中的性意识和言情小说模式。在这种思路背后,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差异性是无意识的产物。所谓“无意识”,关联着的是那些理性之外的思维领域,也即那个理性化的“一体化”力量无法触及的空间。所以,“再解读”和“潜在写作”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们都将文学的差异性寄托在一个观念和体制之外的文学空间上:“潜在写作”的“抽屉”是一种现实空间,“再解读”的“无意识”是一种思维空间。这种对于独立、纯粹、不受现实因素(政治或市场)打扰的艺术空间的追求,本质上与“纯文学”共享着类似的想象。

相比之下,洪子诚先生拒绝了对于“纯文学”和纯粹艺术空间的不切实际的迷恋,干脆转而那些身处政治漩涡的“文学官员”/“文学管理者”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其结果便是《材料与注释》的诞生。这本书所标示的研究范式的转换意义,并不只在于文体上的特殊(这是他人不可学的),而在于将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从1950-1970年代的作家转移到“文学官员”/“文学管理者”身上(这是他人可学的)。其间的差别在于:作家可以找到各种方式为自己营造出

一片多多少少不受打扰的创作空间,哪怕作品只能被放在抽屉里;而对于“文学官员”而言,政治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他们才是“一体化”制度的最直接承受者。但洪子诚先生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人依然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人选择全盘接受政治教条,有的人依然尽量给文学创作留出相对宽松的空间。“有创造力的人”这一问题,在这种差异中显示出关键作用。

表面上,近年来洪子诚先生对于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的兴趣点从“制度”回到了“人”,但这样的“人”与其说是人道主义式的“独立个体”,不如说是和制度不断周旋、肉搏、互相生产的“能动个体”。只有当对文学生产体制的来龙去脉展开清理之后,才能意识到所谓“独立个体精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才能意识到个体的艺术创造力和精神强度并不一定以完全回避政治、对抗观念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往往在与政治的周旋中呈现出更丰富和微妙的面貌。

由作家所创作的复杂文本,以及作家和“文学官员”所共同构筑的复杂文学史,最终需要同样具有创造力的研究者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解剖。文学研究者便是洪子诚先生所关注的第三类“有创造力的人”。洪子诚先生第一篇以“文本”入题的文章,便是关于黄子平著作的读后感。在《我的阅读史》中,我们还能见到他对于丸山升、乐黛云、戴锦华等学者的讨论。他尤其赞赏丸山升先生所提出的鲁迅的“抵抗”,也即既勇敢地投身于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洪流”,又依然坚持个体的自主性,“不是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⑧。这种“抵抗”,正是尝试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开掘出“弹性空间”的做法。

事实上,“阅读史”的文体本身,正透露出对于研究者的文本解读技艺的关注。“阅读史”和“回忆录”有别,“回忆录”往往意味着以亲历者的权威来还原历史现场,而“阅读史”则是放弃追求历史在事实层面的准确性,转而关注个人的文学阅读体验,并将之

视为最可靠之物。“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年青一代而言，历史首先是“史料”，它是一种知识化的存在，是一系列陌生的事件。为了获得关于历史的“知识”，我们需要通过教材和史著加以学习，通过前人的讲述来走进真相。洪子诚先生的重要性最初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现的：他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教材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后辈们也渴盼着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他那里获知1950—1970年代的文坛故事——他关于《新诗发展概况》和“55级文学史”的回顾，无疑提供了这种史料价值。然而，洪子诚先生很少以确凿无疑的态度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即，他很少使用“回忆录”这种文体，甚至，他明确表现出对于“回忆录”文体的不信任。在写于2006年的《我的“巴金阅读史”》中，他指出：

另一点让人感动的，是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的问题。生命与“当代”历史重合的许多写作者，在1980年代纷纷以或虚构，或纪实，或纪实掺和虚构的方式来反思“当代史”。他们或者承担起揭露、控诉的责任，或者塑造被迫害的受难者角色。不过，像巴金这样的严格自省的写作者，确实还不很多见。^⑬

在这段话中，洪子诚先生将阅读巴金《随想录》的重点归结为“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这是一个文学伦理学层面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争论。但同时，他显然也触碰到了更为棘手之处，那就是：历史有时是确凿无疑的史料，但也有时是隐藏在“文本”之中的“叙事”。这涉及到研究者如何辨认表述的真实与虚假。在后来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和“见证文学”的讨论中，这依然是他的重点。沿着这一思路，一方面，对于写作者是否“真诚”的探问构成了洪子诚先生后续大量研究的重心；另一方面，当无法得知写作者是否“真诚”之时，解读文本的技艺变得骤然重要起来。它关涉着如何在真伪难辨的叙述中传达和辨认历史真实，这是对于作家和研究者的创造力的双重考验。

于是，在近年来的新作中，洪子诚先生依然对研究者的态度与选择保持关注。但这种关注不那么偏于“抵抗”一面，而更倾向于赞赏研究者如何在文学中发现隐秘的现实“踪迹”。在2021年发表的《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中，洪子诚先生谈到了王佐良的莎士比亚研究：王佐良比较了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同时代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发现同样是描写海伦，马洛充满了对古希腊文化“英雄时代”的神往，表示：“驱使一千只楼船走上海程，/一把火烧尽了古城高塔的——/就是这张脸吗？”相比之下，在王佐良看来，莎士比亚却借助对于马洛的仿写“‘泄露’了1600年前后英国资产阶级的动向”。莎士比亚写道：“她是一颗明珠，/它的高价驱使一千只货船走上海程，/带金冠的君王都成了商人！”莎士比亚在关于战争、阴谋和爱欲的故事中发掘出背后的经济驱动力，在王佐良看来，“这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哪怕是幽微的时代信息的敏感”。而洪子诚先生称赞王佐良的这一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且富启发性”，则是因为王佐良捕捉到了莎士比亚所“泄露”的这一历史信号——他具有和莎士比亚一样的“敏感”^⑭。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洪子诚先生在研究文本时曾强调自己所采用的是“个人”视角，并表示“个人的感受的价值当然不能和那种代言式的叙述，那些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也可以为一些有差异的，有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碎片留出表达的空间”^⑮，但是，这依然只能被视为一种谦辞。事实上，他所寄望的“个人”，不是简单的怀疑主义者，不是八九十年代语境中的“个人主义者”，而是真正有品位、有史识、有鉴别力的“理想读者”，能够通过文本与作者心意相通，从字里行间读出隐匿着的微言大义。至于他对文学阅读如何受限于时代语境的种种反思，其目的并不在于宣布“个人”的无能为力，反而在于期盼意识到时代限制的、作为“有创造力的人”的研究者能够超越这种限制。

三、余论：对于“经典性”的重新思考

在文学史中发现了一个个“有创造力的人”之后，1950—1970年代文学的整体“描述图式”也必将呈现出不同样貌。这就回到了2009年“北京的另一位学生”向洪子诚先生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讨论那个看起来十分光滑的话语形态内在的复杂性？”

可以说，近年来洪子诚先生不再强调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一体化”的不可撼动性，而是着力于发掘其中那些多样化的历史潜能。如果说，在2002年的通信中，李杨对于“一体/多元”这组概念的质疑，在于提出1980年代文学并非“多元”而是另一种“一体”，那么，洪子诚先生近年来的研究则指出1950—1970年代文学既是“一体”也是“多元”的。这是一种寻找希望的文学态度，由此，他也引领了当代文学的最新研究潮流，开辟出众多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增长点，如由《材料与注释》所引发的对于“周扬派”的关注，由《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所引发的对于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世界想象的关注等。

这种阐释的结果，则是可能导向对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经典性”的重新认识。这种“经典性”，不仅是建立在历史性意义上的“红色经典”^⑩，更或许是建立在文本本身的艺术复杂性和思想复杂性之上的“文学经典”和“文化经典”。当洪子诚先生在《我的阅读史》中讨论自己对于郭小川的“重读”时，当他在《回顾一次写作》和《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中反复回味自己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和“55级文学史”的历史时，当他看到了1950年代的田汉和2010年代的孟京辉与马雅可夫斯基剧作《臭虫》的对话时，当他在那些看似“过时”的批判资料中读出社会主义对创造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型文化形态的渴望时，这种重读行动和结论本身便证明了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经典性”——如卡尔维诺所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

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更重要的是，“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⑪。而这些关于“经典”的秘密，均存在于文本的内部，等待着“有创造力的人”打开。

注释：

①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②洪子诚：《文本“缝隙”与“历史深处”》，《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14日。

③⑦洪子诚、耿占春、敬文东、姜涛：《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④⑫⑬⑮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第2页、第14页、第16页、序第2页。

⑤洪子诚、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⑥参见洪子诚《“一体化”论述及其他——几份质疑、批评的材料》一文中的“书面问题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⑧洪子诚、冷霜：《回答六个问题》，《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⑨洪子诚：《“一体化”论述及其他——“我的阅读史”之质疑与批评》，《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⑩洪子诚、季亚娅：《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洪子诚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⑪洪子诚、吴晓东：《关于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的对话》，《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⑫洪子诚：《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

⑬洪子诚先生与吴晓东的对话曾讨论过这种意义上的“红色经典”。参见洪子诚、吴晓东：《关于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的对话》，《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⑭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